



▲上海一陈旧居民楼前就是“四大”遗址。

►地处上海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你是领导人，你比我资格老，但我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思想立场，这就是我要和你辩论的原因。”建党初期的几年时间里，弥漫着一股开放、自由、平等的争论风气。这股民主争论之风，就如陈独秀所说那样：“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

“我强烈反对你的意见”

在中共“三大”上，民主、开放的争论氛围一直弥漫会场

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一条寻常巷陌，宁静雅致，绿树成荫。广州恤孤院路后街31号，只留下一段平平常常的红色墙基。

这里是中共三大会址所在地。88年前那栋独立二层民居，早已在1938年的日军轰炸中消散。

记者站在门外，遥遥听着屋内激烈的争论声。

“不能把工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工作都交给国民党。”这好像是蔡和森的声音。

“我强烈反对你的意见。”另一个女声传来，比蔡和森的声音还高。

这是向警予的声音。如果不是熟读这段党史，还以为是哪两口子在吵架——蔡和森和向警予是共产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革命夫妻。

可这是在中共“三大”的会场上。

夫妻俩在“三大”上吵起来

那个年代，因为某人的领导地位而隐藏自己的意见，很多人难以做到。在观点立场、政治主张面前，上下级领导和亲疏友情都被放在次要位置。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那所寂静的二层民居里召开。会上，代表们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这次争吵的原因，是关于共产党是否加入国民党。

会上，蔡和森和向警予这两口子竟然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吵了起来。

向警予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陈独秀等人的观点一致，她和他们认为，中国目前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

这样针锋相对的意见，经常发生在“三大”九天的会议上。

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关系最特殊，他俩不仅是战友，还是夫妇。

23岁的向警予在1918年拜访北大校长蔡元培时，结识蔡和森，爱情在一年多后的赴法旅途中萌发。但这对革命伴侣在“三大”上持不同观点，各不相让。

“蔡和森和他爱人散会后回到住处，

还争论得相当厉害。”代表徐梅坤后来回忆。

而这种公开、开放的争论氛围弥漫在“三大”上。

代表共产国际的马林认为：如果中共不加入国民党，急于寻求盟友的苏俄将一事无成；而全国仅有420名党员的中共也不可能有多大前途。

中共在“二大”上就争论过国共合作，但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作”。

最后，陈独秀无奈地被强势的马林说服，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问题，拿到“三大”上讨论。

但在讨论陈独秀先生这个报告的时候，激烈的辩论便正式展开了。

这个问题虽有马林和陈独秀的明确主张，但代表们并不因为这两个人而放弃自己的观点。

“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徐梅坤回忆。

陈独秀做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遭到了16票的反对，仅以5票的微弱优势通过。

陈独秀、李大钊尽管身居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和委员高位，却无法逃避代表们的质问、责难。

杨明斋一向崇拜陈独秀，但“三大”后，他指斥陈独秀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与陈大闹一场，声称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

“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

在后来的北京党员大会上，又展开了一次国共关系的大争论。李大钊在会上报告称：自己已被指派为代表，准备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

有人问：“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领袖，现在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你将采取何种立场？”也有人问：“国民党要你宣誓服从三民主义，忠于国民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你将何以置答？”

“这些问题都是李大钊先生所不答复的，多数同志不赞成中共党员充当国民

党代表。”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讲，有人说：“李守常(李大钊——记者注)先生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

相对于李大钊的身份，这是句很不客气的话。

那个年代，因为某人的领导地位而隐藏自己的意见，很多人难以做到。在观点立场、政治主张面前，上下级领导和亲疏友情都被放在次要位置。

“反对派”高票当选

“对中共早期会议出现的争论现象，要放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解读。当时全国共产党员没有多少人，秘密地存在，没有可支配的资源，官本位之类的东西还未形成。所谓的书记，也就管这么多人，可支配的资源很少。”

其实，早在“一大”之前，李汉俊就和陈独秀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事实上，建党后的几次中共代表大会上，很多问题都是在广泛讨论中解决的。

当时，李汉俊认为陈独秀起草的党章是搞中央集权，很不满意。

他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且在“论战”中提出两点：中央集权会流于个人专制，会被野心家利用作恶；而中国过去都是专制，中共新中央如果集权制的话，会流于覆辙。

陈独秀大发雷霆，甚至为此批评同在会上的李达，说上海的党员在反对他。

到了最后，陈独秀的主张还是主流，党内多数党员都对此赞同。

意见不统一，争执不下时，李汉俊愤怒地辞去了陈独秀让他担任的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的职务。

接替者正是见证两个人不同意见的李达。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李汉俊的观点未必没有合理性、参考性。另一“三大”代表何孟雄的观点与李汉俊颇为相近，他曾和中共中央局成员罗章龙有过一番争论。

“中国革命命运，固然应由群众自己掌握，但须以党内实行充分民主为条件。”何孟雄说。

而罗章龙相信，只要大家意志统一坚

强，内部谁专制?万一将来党内出现妄人，群众自然把他打倒，也不会是难事。

但李汉俊和何孟雄的结局却不一样，何孟雄入了党，李汉俊却和党脱离了关系。

年轻的共产党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在中共中央早期机关报《向导》上，曾刊登过张国焘与瞿秋白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先驱》上也曾发生刘仁静与施存统关于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关系的直接辩论，而一场理论与实践哪个重要的争论，也曾发生在建党初期。

对这样的争论，张国焘表示认同，并评价说，那时候不会因为不同意见而给同志扣上“政治”的帽子。

事实也是如此。

在几次大会上，即使持反对意见的人，也能得到党内宽容对待，而不是承受高压政策与组织打击。

蔡和森是坚决反对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反对派”代表，态度坚决，屡屡“开炮”。但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时，蔡和森仍然获得了40票中的37票，高票当选。

那时候，这种在公开场合、公开方式下大小的争论，印证了参与者开放、宽容的心态。

“对中共早期会议出现的争论现象，要放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解读。一大、三大有较多的争论，一是许多理论不清楚，争论难免；二是全国共产党员没有多少人，秘密地存在，没有可支配的资源，官本位之类的东西未形成。所谓的书记，也就管这么多人，可支配的资源很少，真正权力在共产国际。”山东省高校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学会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张福记认为。

蔡和森是坚决反对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反对派”代表，态度坚决，屡屡“开炮”。但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时，蔡和森仍然获得了40票中的37票，高票当选。

那时候，这种在公开场合、公开方式下大小的争论，印证了参与者开放、宽容的心态。

“对中共早期会议出现的争论现象，要放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解读。一大、三大有较多的争论，一是许多理论不清楚，争论难免；二是全国共产党员没有多少人，秘密地存在，没有可支配的资源，官本位之类的东西未形成。所谓的书记，也就管这么多人，可支配的资源很少，真正权力在共产国际。”山东省高校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学会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张福记认为。

蔡和森是坚决反对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反对派”代表，态度坚决，屡屡“开炮”。但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时，蔡和森仍然获得了40票中的37票，高票当选。

那时候，这种在公开场合、公开方式下大小的争论，印证了参与者开放、宽容的心态。

“对中共早期会议出现的争论现象，要放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解读。一大、三大有较多的争论，一是许多理论不清楚，争论难免；二是全国共产党员没有多少人，秘密地存在，没有可支配的资源，官本位之类的东西未形成。所谓的书记，也就管这么多人，可支配的资源很少，真正权力在共产国际。”山东省高校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学会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张福记认为。

而罗章龙相信，只要大家意志统一坚

最高领导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张国焘、陈独秀批评他的思想非常狭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会上，陈独秀还指出自己的错误

作为党中央的“大哥”，就拥有绝对的

●“文革”开始后，李达遭到大大小小的批斗，绝望中的李达给毛泽东写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据说，这是李达生平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但遗憾的是，毛泽东收到信之前，李达已不幸被摧残致死。

●41年后，张国焘在加拿大老人病院，无力捡起掉在地上的毛毯而被冻病，因此离世。

●矛盾在解释知识分子特性的时候说，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的这种习惯，在他那一辈人中间是很平常的。当形势突变时，往往要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

那些脱党的一大代表

本报记者 任鹏

筹备建党时，李汉俊和陈独秀在诸多问题上就有不同看法。在“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后，两人的距离越走越远。

李达常在两人之间调解，不过李汉俊不肯接受调停，态度坚决地把一些文书交给李达，连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也不做了。

1922年2月，李汉俊负气离开上海的党组织，到了武汉。陈独秀对李汉俊没有多大成见，“二大”时，向他发出邀请。但李汉俊没去，托人带了一封意见书，还是表示反对集权制、铁的纪律。

据张国焘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李汉俊时，觉得这个人不容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达不同的见解，喜怒不形于色。

矛盾后来对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也有回忆，说李汉俊有很重的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坚持个人的独特见解。

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李汉俊自动脱党，除掉了他的党籍。

脱党后，李汉俊担任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务。

但李汉俊此前的中共领导身份给他带来了麻烦，国民党右翼仍认定他是亲共分子。1927年，李汉俊被桂系军阀逮捕，未经审讯便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终年37岁。

同为建党创始人，李达后来也与陈独秀闹掰了，但与毛泽东关系不错。“二大”上，他表示不再担任中央宣传主任，之后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住在清水塘。

在张国焘眼里，李达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就会瞪大双眼注视对方，好像是怒不可遏的样子。说话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到1923年秋，李达正式脱党，他认为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对加入国民党想不通；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

1927年之后，结束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的李达，陆续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任教，教唯物论哲学。

埋头著作的李达写出了《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后来读了足足十遍，并写信称赞李达是一个“真正的人”。

1948年，李达的人生迎来转机，他接到了毛泽东赠送的暗语信，上面说：现在公司生意兴隆，希望你赶紧回来参与经营。

李达辗转到了北平，毛泽东还专门派人在车站迎接。见面时，毛泽东仍称李达为“鹤鸣鸟”。

随后，李达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作为历史证明人，在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重新入党。

“文革”开始后，李达遭到大大小小的批斗，绝望中的李达给毛泽东写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据说，这是李达生平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但遗憾的是，信件辗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时，李达已不幸被摧残致死。

出席“一大”的包惠僧曾出任党内重要职务，后来奉命加入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回忆录中自称是“消极脱党”。

此后，包惠僧在国民政府任职直到1948年。

包惠僧和陈独秀私交很好，陈独秀去世之前，这位老友还赶到江津探望。但他一向胆小谨慎，怕“四旧”时怕惹事，就让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忍痛烧毁。这些信原本是他想永久保存的。

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思想后，包惠僧1957年成为国务院参事，22年后，因病离世。

1922年—1927年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捕德里625号召开。

192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恤孤院路后街31号召开。

●“文革”开始后，李达遭到大大小小的批斗，绝望中的李达给毛泽东写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据说，这是李达生平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但遗憾的是，毛泽东收到信之前，李达已不幸被摧残致死。

●41年后，张国焘在加拿大老人病院，无力捡起掉在地上的毛毯而被冻病，因此离世。

●矛盾在解释知识分子特性的时候说，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的这种习惯，在他那一辈人中间是很平常的。当形势突变时，往往要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

那些脱党的一大代表

本报记者 任鹏

筹备建党时，李汉俊和陈独秀在诸多问题上就有不同看法。在“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后，两人的距离越走越远。

李达常在两人之间调解，不过李汉俊不肯接受调停，态度坚决地把一些文书交给李达，连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也不做了。

1922年2月，李汉俊负气离开上海的党组织，到了武汉。陈独秀对李汉俊没有多大成见，“二大”时，向他发出邀请。但李汉俊没去，托人带了一封意见书，还是表示反对集权制、铁的纪律。

据张国焘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李汉俊时，觉得这个人不容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达不同的见解，喜怒不形于色。

矛盾后来对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也有回忆，说李汉俊有很重的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坚持个人的独特见解。

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李汉俊自动脱党，除掉了他的党籍。

脱党后，李汉俊担任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务。

但李汉俊此前的中共领导身份给他带来了麻烦，国民党右翼仍认定他是亲共分子。1927年，李汉俊被桂系军阀逮捕，未经审讯便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终年37岁。

同为建党创始人，李达后来也与陈独秀闹掰了，但与毛泽东关系不错。“二大”上，他表示不再担任中央宣传主任，之后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住在清水塘。

在张国焘眼里，李达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就会瞪大双眼注视对方，好像是怒不可遏的样子。说话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到1923年秋，李达正式脱党，他认为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对加入国民党想不通；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

1927年之后，结束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的李达，陆续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任教，教唯物论哲学。

埋头著作的李达写出了《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后来读了足足十遍，并写信称赞李达是一个“真正的人”。

1948年，李达的人生迎来转机，他接到了毛泽东赠送的暗语信，上面说：现在公司生意兴隆，希望你赶紧回来参与经营。

李达辗转到了北平，毛泽东还专门派人在车站迎接。见面时，毛泽东仍称李达为“鹤鸣鸟”。

随后，李达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作为历史证明人，在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重新入党。

“文革”开始后，李达遭到大大小小的批斗，绝望中的李达给毛泽东写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据说，这是李达生平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但遗憾的是，信件辗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时，李达已不幸被摧残致死。

出席“一大”的包惠僧曾出任党内重要职务，后来奉命加入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回忆录中自称是“消极脱党”。

此后，包惠僧在国民政府任职直到1948年。

包惠僧和陈独秀私交很好，陈独秀去世之前，这位老友还赶到江津探望。但他一向胆小谨慎，怕“四旧”时怕惹事，就让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忍痛烧毁。这些信原本是他想永久保存的。

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思想后，包惠僧1957年成为国务院参事，22年后，因病离世。

1922年—1927年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捕德里625号召开。

192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恤孤院路后街31号召开。